

七. 宗教精神的缺失与高犯罪率

蔡德贵教授

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所

在世界范围内，高犯罪率成为普遍现象，尤其表现在战争犯罪、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宗教精神的缺失。

走出对宗教认识的误区

对于宗教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千百遍地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科学技术越发展。信教的人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那么多人去自觉地吸食鸦片？人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英国历史学家洛德·阿克顿强调，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转引自方立天：《人文科学课题中的应有之义——重视开展宗教学研究》，北京：《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1996年第6期）。事实上，宗教也是现实的钥匙，宗教现象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是有普遍意义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宗教精神重要性已经确认，宗教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通用语言”。（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11页）季羨林先生近些年来一再强调：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因为宗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虚幻的需要，还是心理的需要，真正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虽然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季羨林：《人生絮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页）。从人的认识领域来说，不管人的认识能力有多强，科学多么发达，总会有一些未被认识的领域和不能理解的现象，而“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7页）。所以，我们对宗教的存在，用不着大惊小怪，对宗教的作用不要低估。中国汶川地震之后国外媒体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宗教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认为宗教信仰或可复兴。

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

我在2007年《河北学刊》发表的文章《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中提出：人类精神主要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而筷子、手指和刀叉三大文化圈都富有这三种精神，但又分别主要体现着其中一种主要的人类精神。如中国的筷子文化圈着重体现人文精神，印度和中东的手指文化圈着重体现宗教精神，西方的刀叉文化圈着重体现科学精神。这三种精神具有不同的功能：科学精神的主要任务是求真，宗教精神的主要任务是求善，人文精神的主要任务是求美（心灵美）。这三种精神共同作用并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人类的健康成长是三性统一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应该是这三种精神的协调并行发展及互补。科学精神主导人去求真、证真、验真，告诉人们“是什么”；人文精神主导人去求美：道德美、心灵美、人格美，它提高人的骨气、志气、勇气，告诉人们“如何作为”，使人的一举一动都合乎礼仪；宗教精神主导人去求善、扬善、行善，告诉人们“如何超越”，使人心灵纯洁。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培养人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必须适应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性，实施物质教育、人文教育和灵性教育，从哲学架构上实现三大文化圈的互补，这便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之所在。这篇文章被2008年《新华文摘》用《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摘登了我的上述观点。

以往我们忽视宗教精神，而宗教家评价极高，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能发展。他们还认为，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源的悟解。但在我们无神论者看来，宗教中绝对有不符合科学的因素，如提倡上帝的存在，肯定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是与科学不一致的。但是宗教精神中提倡人应该为善的一面，可以化为积极的人文精神，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起到人文精神的作用。正如卓新平在《化解冲突——宗教领袖对人类和平的新贡献》（载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一文中所说的：

宗教精神自远古以来就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社会中的安宁和人类心灵的平静与超越。各种宗教以不同的语言和表述来强调“护生”、“至善”、“平和”、“博爱”，宗教领袖以其教诲和行为在人类和平事业中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和典范。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不少宗教领袖都提倡一种普世之爱和人人共享之和平，从其宗教教义及传统中阐发其对和平的追求。例如，中国传统宗教中的“仁爱”、“仁者爱人”和以“仁义礼智信”来影响社会的思想；道教回归自然、与自然保持平和，认为万物平等、物我合一，世界和谐的主张；佛教“大悲为首”、“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精神，等等。这些宗教中的和平精神铸成了中国人“为善”、“致和”、“成仁”、“赞天地之化育”、“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凝炼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伦理精华，亦展示了中国宗教领袖的人格风范。在协调当代中国社会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中，中国宗教领袖亦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基督教领袖丁光训主教就曾提出“中国神学建设”的创意，从“创造”、“爱”、“真善美”等基督教信理上和“宇宙的基督”之观念上推崇人类的对话与和解，表现出开放、包容、合作、博爱的精神。正是宗教领袖与广大信众的共同努力，宗教的冲突得以不断消除和化解，人类正朝着更多“对话”和“理解”的方向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都隐含着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中表现出来。《道德经》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把道作为一种最高的宇宙本体来看待。提倡对道要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这类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从老子和庄子开出后来的道教，是一点都不意外的。《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西狩获麟；孔子有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足见儒学有其“宗教性”之内涵，这种“宗教性”，并不是说儒学是具有严密组织的制度化宗教，而是指儒学价值的信仰者们，对于超越的宇宙本体所产生的一种向往与敬畏

之心，认为人与这种超越的宇宙的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生共感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这种信仰是一种博厚高明的宗教情操。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也并不缺乏宗教。应该承认，宗教需要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事实证明，包括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也有过宗教需要。毛泽东也有过宗教需要。宗教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宗教精神走向极端，会变成迷信。而宗教精神中的积极因素被发掘出来，可以为当代的社会服务。人类除了追求物质及知识外，不能忽略个人对宗教精神的需求，提升宗教精神的内涵，才能更有效的面对 21 世纪的种种挑战。

“善”与“爱”是宗教精神的核心

宗教精神是充满“善”与“爱”的，这两种观念正是促使人不去犯罪的主要原因。

劝人从善是各大宗教的基本教义之一。神作为终极正义的裁决者，让人对神有一种敬畏感，信仰神的所有人当然就要作正义之事，就要从善，慈善是所有宗教徒的根本。佛教徒被称为“善男信女”，是宗教的劝善功能而得到的称呼。宗教信徒应该比常人更具善良之心。离地三尺有神灵是随时提醒人们做善事，不做恶事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天命让人行善，古人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昭公十一年》说：“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祸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天命作为最高神来理解。佛教也认为：一念善是天堂，一念恶是地狱。西方传统也认为善是第一动者，是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它由于接触和思想变成思想的对象，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实体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在实现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78 页。）因为“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人生的最大快乐，是至高无上的。“神是赋有生命的，生命就是思想的现实活动，神就是现实性，是就其自身的现实性，他的生命是至善和永恒。我们说，神是有生命的、永恒的至善，由于他永远不断地生活着，永恒归于神，这就是神”。（《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7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53 页）

爱与宗教是相伴而生的，没有爱的宗教肯定不是宗教，而没有宗教的爱则是缺陷。世界上现存的几大宗教都是以爱为主导的，儒教讲求“仁爱”与“恻隐之心”，佛教是以爱为主线的，基督教被认为是“爱的宗教”，伊斯兰教把人对安拉的爱、人对穆圣的爱、人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的爱始终贯穿于其教义与行为之中。

宗教精神可以抑制犯罪

战争犯罪是由于宗教和平精神的缺失。宗教良知的国际表现必须通过对话求和平，促发展。各大宗教都强调和平与公正，要求其信仰者要为消灭不义与压迫、建立公平和自由的世界而献身。没有人会否认，和平是宗教的基本要义，消除战争，化解冲突，维护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呼声。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社会的安宁和人类心灵的平静与

超越是各种宗教的基本精神和实际行动。除了宗教基本精神的要求，以往的历史中，广大宗教徒，特别是一些宗教领袖为化解冲突，维护和平已经做出了种种努力。

佛祖释迦牟尼就要求信徒“爱人如己，勿相残杀”，佛教五戒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大涅槃经》讲述佛祖劝阻阿舍世王侵犯跋只国，表达佛教自古就追求和平。佛教核心是非暴力论，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道教遵循道法自然的和平论原则，慈爱和同、不伤生灵是宗教修持的重要内容。敬重生命，反对杀生，反对战争，主张不同种族、民族、宗教的人和谐相处。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就有和平之意，穆斯林也就是谋求和平之人。《古兰经》召唤和平，主张宗教没有强制性。基督教主张上帝造万物的本意是和平与爱心；世界应当没有贪欲，没有仇恨，没有杀戮，没有战争。基督教强调要爱上帝，还要爱人如己。

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1979 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 年 7 月 2 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阳、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 年 11 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 年 8 月 14 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座谈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 8 月 14 日到 8 月 20 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友好国际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与世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但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资本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 1000 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谱写了一曲曲维护和平的赞歌。中国穆斯林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

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中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族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和平必需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但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需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16章）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的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20年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现在，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经济犯罪中最危害社会和谐和引起公愤的是贪污腐败，其根源是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里认为，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

主义的精神动力。清教徒精神中的“忍欲”和“节俭”，再加上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于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欲望，如果缺乏宗教精神的羁绊，而传统的共同体内互助关系的制约又在市场全球化的冲击下名存实亡，那么包括职业伦理以及行政纪律在内的广义的法治就必将显得更加重要。这正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写照。这也正是解决两种“原罪”问题时不得不通过的安全门。但法治在中国的有效运作也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政府必须严格自律，在守法和维持诚信方面为人民做表率。

刑事犯罪在当前的重要表现是：走私、毒品交易、娼妓和其他“黄色行业”、造假药、地沟油、赌博、拐卖人口、伪造毕业证、倒卖各类批文和许可证、地下工厂、虚开各类发票，尤其是增值税发票、侵吞和挪用国有资产、金融拆借。世俗社会不应该离开对宗教精神的依赖，有深厚宗教资源的国家往往通过宗教精神陶冶教化全社会。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缺乏宗教精神的经济的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如果人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而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社会的发展是很危险的。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最终也只能导致残缺的发展。

恐怖主义犯罪应该属于刑事犯罪，但是由于自 9.11 以来其有增无减的发展势头，人们往往一提恐怖主义，便有谈虎色变的感觉。所以把它单列出来。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就是宗教精神的缺失。就拿自杀炸弹袭击一事，人们往往在这些袭击者那里看到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其实宗教极端主义正是对宗教精神的背离。任何宗教都尊重生命，把生命看做上帝所赐。伊斯兰教明确规定，穆斯林认为，生命是安拉通过父母给予的，生命权由安拉掌握，所以，穆斯林不能自杀；伊斯兰教反对“安乐死”。在伊斯兰教中自杀是绝不允许的，因为安拉不但赐予人类生命，而且启示人类如何善待生命。

发扬宗教真精神

宗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人向善，也可以导致战争。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都是与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未来社会中，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很可能都是由宗教势力所决定。

我们应该牢记爱因斯坦的话：宗教与科学存在着“牢固的依存性”，“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182—183 页）。“人类精神愈是向前进化，就愈可以肯定地说，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第 181—186 页）。在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世纪大讲堂”节目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谈到量子物理发展到今天对物质的认识层次时，说：“物质的结构是如此的精细，这绝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对物质的最终认识不是科学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能解决的，也许只有宗教能解决。”在谈到科学发展的前景时，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

列夫·托尔斯泰在阐述西方宗教精神时所说：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在《向上的第一步》(The First Step)中，他说：“人类对杀生的行为是如此强烈地厌恶。然而人们却相与效尤，放纵贪欲，借口上帝不禁杀生，特别是蔽于积习，因而轻易地丧失了本心。我只想，一系列的善举乃是通向至善的必由之路；如果人对善的向往出自真心，则他们必须遵循一定的步骤，身体力行，才能达到；而在这一系列步骤中，人首先应该努力实践的就是克己、自律。实践克己与自律的努力必须遵循一系列的步骤，其中首先应该

做到的就是饮食习惯上的节制。而且，如果人们真正严肃地向善，他们首先应该摒弃的就是杀生取食，因为，且不说肉食带给人狂躁的情绪，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与人性相违背的屠杀，而只是为了满足人的贪婪与口腹之欲。屈于众议而昧于理性的人会问：‘但是，既然杀生食肉之为不义早为人所共知，为什么人类还不能服从勿杀生的戒律呢？’我将回答：因为人类道德完善（这是其它一切进步的基础）的步伐总是缓慢的，然而真正的、并非表象上的进步乃是表现在永不停滞、与日俱新，渐脱于卑下以就于崇高的努力。”（http://www.ivu.org/chinese/history/tolstoy/step_big5.html）

可惜的是人们把宗教善的本质忘却得太多。在当今世界宗教精神被忽视，宗教权威被滥用。“宗教组织一旦制度化了，法制化了，宗教偏执的伤心惨目的历史似乎就注定不可避免了。而且宗教偏执行为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人们对国教的极大的不满。许多人正转而投奔所谓的“次要”宗教，以图找到一条获得精神满足的途径，既不那么刺耳，却又那么温柔。当然，现在各式各样的新宗教运动多的是，其中的某些运动比传统的宗教更偏狭，更邪恶。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强调神秘主义以及安宁的内心探索的重要性，并以此与传道的狂热相对，因而吸引了对定为国教的宗教的社会及政治影响持批评态度的那些人。”一旦宗教被制度化，“宗教常常更关注权力、政治，而不关注善与恶。宗教激情则更为经常地导致暴力冲突，搞乱了人类正常的宽容精神，释放了野蛮与残暴。基督徒在中世纪对南美当地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就是较为可怕的例子之一，而在欧洲的历史之路上则到处都横陈着人类的尸体，那是些因为微小的教义分歧而被杀戮的人。即便是在那所谓的启蒙时代，宗教仇恨和宗教冲突也遍布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多数宗教都赞美爱心、和睦、谦卑，并将这些称之为美德，但世界上各大宗教组织的历史却常常是以仇恨、战争、傲慢为其特色的。”（保罗·戴维斯（英国）：《上帝与新物理学》第一章《科学与宗教在变化着的世界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http://bbs.cqzg.cn/thread-503842-1-1.html>）为此，我们呼吁宗教组织和宗教管理部门为发扬真正的宗教精神而奔走呼号。我们有“科教兴国”的方略，和“以德治国”的思想，国家提出了对宗教要积极加以利用、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两种精神同时提倡起来，使它们并行不悖，再把宗教精神中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无往不胜，变成强大的物质文明之国、精神文明之国。